

【思想文化】

西部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情怀

戴生岐

(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从文化的维度出发,站在从下往上、从内向外看的观点上,审视西部文化,不难发现在其浓郁的前现代文化景观中所蕴含的深厚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情怀。在信息革命浪潮方兴未艾,后现代化新波紧随现代化浪潮扑面而来的21世纪,重新观照西部文化,便会发现其前现代化的文化基核与后现代化文化神韵的某种对接和呼应的势态,文化建构的前提是对我们脚下土地所生成的文化的自省和自觉,只有站在未来信息化社会的立场上扬弃我们既有的文化,我们才能从简单的否定、肯定的误区中走出来,从而整合出符合西部大开发新要求的全新的文化。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西部文化;多元混成;共存共赢;类特性理论;世俗文化;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2-0004-05

Complex of postmodernism in western culture

DAI Sheng-qi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culture, standing at the position of up to down and inside to outside to review the western culture, it is easy to find ou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complex of postmodernism from dense pre-modernism culture. In the time of informational revolution and dawn of postmodernism, reviewing the western culture, we can see the tendency that the core of pre-modernism culture corresponds with that of postmodernism culture. The premise of cultural building is to introspect and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existing culture. Only developing the useful and discarding the useless in our culture can we make a totally new culture suitable for the western exploitation.

Key words: western exploitation; western culture; blending of many factors; co-existing and co-winning; specific theory; civil culture; postmodernism

1999年6月17日是一个永远需要西部人铭记的日子。正是这一天,在西部,在十三朝王都所在地西安,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时代动员令。近五年来,西部热,西部潮,西部开发、西部腾飞成为热门话题。全国人民,包括世界华人在内的全球有识之士,都将目光投到西部。开发西部需要对西部有一个较为深刻地了解。解读西部有许多维度,从“文化”切入,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维度。

我们以为,只要认真审视、解读西部文化,不难发

现在她的独特魅力中潜蕴着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一、“内隐”与“外显”,西部人民文化心理取向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

(一)共时性的多维向心组合所产生的多元混成开阔恢弦后文化气象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

文化开放发展的前提是文化的保存和沉淀。而在这点上,西部“山高皇帝远”的地理阻隔性,恰恰成了文化样态及其个性得以咀嚼、回味、保存的首要条件。我们甚至于不难感受到,正是西部地老天荒、相

收稿日期:2003-10-31

作者简介:戴生岐(1956-),男,陕西岐山人,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

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才得以使文化使者传入的文化食粮让西部文化人在“闹中取静”的氛围中得以整理和保存。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兵荒马乱,人们携带着儒道互补型的中华文化精品,向西部边陲逃难,而西河一带偏安一隅造成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如河西走廊上的四大故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便成了人们整理国故,承先启后的最佳处所。而事实上,西河人果然不辱历史使命,他们尊儒重道,阐佛惟创。陈寅恪先生认为,不了解西河人在此间的文化建设成就,就不能承上启下对中国从汉到唐文化的演进历程有一个贯通式的了解^[1]。西部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在人类文明开化的草创期,诸大文化的生发核心—缙圆圈地码开在中国西部之西帕米尔山结周遭靠海的平原地带。在大江、大河与海洋相联的三角洲地带以及内陆海沿岸,如地中海、波斯湾等地域,纷纷冒出了人类生存的祥天福地和文化地图的高峰巨岭。黄河文化、恒河文化、尼罗河文化、两河文化、地中海文化等等原始文化样态构成了人类最早的蔚为大观的文化风景,而耸立其中的地理之巅却沦为文化地图上的低谷和荒漠。然而,“水是万物之源”,自然也是文化的母亲。就在山之岚,林之雾,云之霓,蒸腾酝酿而形成的人类生命的命脉向四周流淌浸润的时候,溯流而上的“文化反哺”现象也渐成气候。随着文化交通干道一条条的被开凿,“世界屋脊”也开始享受到了他的子孙们回馈的文化甘霖的滋润。通过千百年的多维向心交汇,逐渐在广袤高耸的西部形成了六圈四线的文化地图——即新疆文化圈、青藏文化圈、陕甘文化圈、蒙宁文化圈、川渝文化圈、云贵文化圈以及与它们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的丝绸古道、唐蕃古道、草原古道和南方丝路^[2]。我们从六个文化圈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古波斯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蒙古文化、古地中海文化和古中国中原文化在中国西部不同程度的组合交融。而四条文化古道则保证了西部六文化圈各自组织结构的“耗散性”、开放性。通过吐故纳新、内外沟通、多维互动,从而使西部文化保持了历久弥新的多维多样的综合杂多、开阔恢弘的生机和气象。

(二)历时性的动态多变积淀所产生的文化精髓与后现代主义的呼应

如果以历时性的角度看,西部文化则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两大发展阶段,现在则处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回归阶段。如果以朝代维度审视肯定阶段所对应的文化类型,则表现为周、秦、汉、唐四大文化类型^[3]。四大文化类型在前后相继中形成了动态多

变、不断丰富的文化积淀。以陕西为例,上溯周秦,下迄汉唐,四大文明的光环连连相扣,组成了第一个千年以陕西为原生地向四周辐射的西部辉煌,这一辉煌是整体性的。从物质文明看,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傍渭水,气候温暖湿润土质疏松宜耕。周据关中,教民稼穡,“周塬月无月无,董荼如饴”,分封诸侯,东伐殷纣,制礼作乐,亲和天下,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秦据关中,凿渠灌田,实行耕战,南吞巴蜀,西和诸戎,北备匈奴,东对诸雄,书同文字,车同规矩,兴修驰道,厚筑长城,实现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大业。汉承秦制,文景初兴,武帝大治,北镇直道,南通夜郎,西域凿空,东纳楚风,给雄壮阳刚的周秦文化注入了楚地文化优美的新风,遂奠定了以汉文化为基核的中华文化的基本框架,并且拉开了汉唐盛世的序幕。唐都长安,如日中天,帝王胸襟开阔,民众大气自信,万方辐辏,近悦远来,汉胡一体,世所共仰,其基础设施据史载是:驿道坦通,水运便捷,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行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舶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遂成世界人民向往的风水宝地。从精神文明看,周文化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谐思维与公关精神,崇尚礼乐的中华人文精神的原生形态;秦文化中的纳异进取的开拓竞争心态和讲求功利的工具理性主义倾向;汉文化中的以柔济刚,健顺有为,综合杂多,开阔恢弘的大家气象;唐文化中的开放豪迈,悦纳“胡风”,转换生成,不断创新的文化自信情怀。所有这些文化,都组成了历时性的动态多变的丰富的文化积淀。

(三)西部多民族插花杂居的人居环境所形成的“生人文化”与现、当代彰显的“契约文化”相切合

西部人多民族小聚居,大杂居,淡漠血缘、地缘关系而插花交错,交流互动,和谐共处的人居环境,形成了西部人民心理结构上的兼容并包,纳异进取,整合共赢的社会心理特质和价值取向,从而也和现代人,乃至后现代人崇尚契约,注重规则,不尚人情,鄙夷“山头”,不惧陌生的文化价值心态相切合。流动性很强的“杂居”状态必然弱化血缘关系上的“孝”的心理场和地缘关系上的“义”的心理场,也必然会淡化“为仁(孝)作义”所导致的小集团利益结构对国家公共利益整体结构的冲击的可能性。

总之,文化的精髓是思想,而其载体则是创建它的人民。马克思指出,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综上所述,西部人民无论在共时性的状态下接纳八方或是在历时

性的状态下积淀诸朝,在此间表现在“内隐”性层面即思想精髓上的多元混成,大而化之,崇尚感性,消弥殊异,解构差别从而也必然极富创新活力的远古遗风,以及在“外显”性行为导向上接纳陌生,扬弃“孝义”的整合共赢的利益价值取向,与后现代主义在思维方法上崇尚解构,淡漠理性,以及在行为导向上鄙薄特殊、追求普遍的价值观念不无切合。

二、合、和、平的精神气质与马克思“类特性理论”的贯通

西部随处可觅的前现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人际和谐的人文景观,心物平衡的心灵景观,与现代社会中对马克思充满着后现代情怀的“类特性理论”的呼唤的时代气息相切合。

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早些时日被以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有所揭示。美国学者巴雷特在研究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时,指出了存在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三重异化”现象^[4],这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和社会和个人的异化。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就指出,这种“异化”意味着人向“非人”的转化,同时也必然伴随着真正人的回归,从而表现为人的发展历史上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大阶段,即“人——非人——人”这个三段模式。马克思坚信,人类当然不会回归自己的童年时代。但是,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完全可以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实现“仿佛”向第一个原始的人的阶段的某种回归。马克思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善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5]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反映了他的内涵丰富的“类特性理论”。而马克思的类特性理论中所蕴含的极具前瞻性意味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被后来的学生们所发扬光大。这种发扬广大就充分体现为他们所主张的“反中心主义”的倾向。

反中心主义表现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主要有三重义项:首先,在“天人关系”上表现的对两个“中心主义”的反驳。“天人关系”上的“中心主义”在历史上有两种形态:一是中世纪的自然中心主义;二是近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二者应该是平等的关系。这就是他讲的,“人同自然界的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是自

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的人本主义”。^[6]后现代主义大师布伯显然受到马克思的启发,并提出了用“我你模式”(将自然界拟人化为“朋友”)论取代“我它模式”(即将自然界当“异族”,必欲征服而后快)论。这样,中世纪的“大天而思”,“从天而颂”,“敬天保民”的自然中心主义和近代的生产力征服论,“我思故我在”,“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就被解构了。令人不无敬佩的是,早在中世纪宋元之时,关中大哲学家张载就提出了极具超越性意味的解构两个中心主义的哲学命题。这就是他讲的“民胞物与”的光辉思想。而它的实践者,当以藏胞的所作所为为最经典。在雪域高原,人们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相待的朋友关系。因为一方面,他们认为,与人相亲相爱的雪山、蓝天、白云本身有“灵性”和“神性”;同时,人自身也具有神性的灵光,人不能作贱自己,从而完全匍匐在自然的脚下,人也应该尊敬自己,尤其要尊敬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生命力,以及给自己带来生命的父母、家庭等。这可以从他们相信人有生命神、父神、母神、家神、舅神五神相佑的宗教观点看出来。

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的“类特性理论”中的反中心主义思想,我们可以从邓小平的“人类发展观”^[7]和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所阐明的“共存共赢”理论观点看到其发展的势头。邓小平认为,应该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发展问题。这个“全人类”首先涵盖着共时性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级、集团、阶层的人们;也涵盖着历时性的不同代的人们。而江泽民的“共存共赢”论,则简而明的涵盖了人类与自然,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社会与个人的三重“共赢”。其中的“去中心”、“去基础”的非一元决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情怀是昭然若揭的。只有按“三个共赢”去行事,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发展”,也就是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同样启发了后学之士。如德国的哈贝马斯,就重点诠释、发挥了人与人的“共存共赢”的反中心主义的理念。他由此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认为必须在人际交往中淡化“主体”意识,强化“主体之间”意识。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主——奴式的主制关系,不是我说你听的独白关系,也不是“我打你通”的强迫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对话关系和朋友关系。我们不无惊赞地发现,西部人在阿注婚俗中所表现的男女关系的平等意识,集中体现了某种人际关系上的后现代主义情怀。

最后,在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的

中心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反对以社会发展、社会进化的马首是瞻而无视社会的全面进步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观点。现代主义倾向观照下的“发展观”，往往过份强调“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而社会发展也过多地被予赋了以经济发展的马首是瞻而不管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方面协调发展的色彩。其结果，经济指标虽然上去了，社会全面进步对政治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要求则被忽视，从而对社会的协调、良性和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这一偏狭的“发展观”压根儿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导致发展的畸型与跛足，甚至导致“人的不在场”和“人学的空场”。从而广泛地发生物役现象、异化现象、两极分化和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环顾西部，我们发现西部人民对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风光的情有独钟，以及对现代人物役性人格和心态的嘲笑，对现代人“浮躁”情状的揶揄，对天籁之声、天籁之乐的喜悦和坚守，作为一道道亮丽的西部人特有的心灵风景，正与现代人企图突破“物”的“奴役”和“文化膜”的包裹，回归自然、放逐心灵，归真返朴，从而过一种闲适随意的生活，以期修补业已破碎的心灵世界，致成外物丰殷与内心充实的平等，并期望达到社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以及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理想目标相切合。

三、“圈外心理”、草莽情怀、“另类”神韵与反基础主义倾向的呼应

西部人因地理环境上的“边、远、荒、穷”特色而形成的“圈外心理”，草莽情怀，使他们容易形成疏离主流、中心、一元、正统、精英式的庙堂文化的倾向，从而形成某种守边缘、去中心、尚多样、非正统、民间式的世俗文化心态。而这一点，恰恰与现代人极力欲求突破一元文化决定论的盘丝大幕，呼唤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心态相吻合。

基础主义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它是指人类为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寻找一种最终无可置疑的绝对基础的文化努力。在罗蒂看来，不仅传统西方哲学文化思潮，而且作为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都无一例外地归属于这种基础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断然否定一种基础存在。在他们看来，这种基础主义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积习，而且也必然导致一种所谓的“权威话语”的垄断统治，导致用“一元”来取代“多样”，用“统一”来取代“差异”，而“统一口径”、“一元决定论”必然通向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父权主

义、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

回眸历史，西部文化历来游离于中原中庸正统的庙堂文化之外，产生了“诗经”的陕西，虽最接近中原，然而，其文化特质仍然具有某些边缘性的反基础主义的色彩。诗凡三百零五首，当然也有雅颂高堂之音，但更多的是世俗民间之气。所以中国西部的文化是所谓的“夷狄之地”的文化。因此，很难跻身于大雅之堂，从而以正统形态，典雅方式存留于典籍和庙堂中。因而，它有可能在疏离儒道互补文化圈时，较多地保存下自己的多元品格、阳刚之气和创新活力，从而使中国文化有一个新陈代谢、不断发展的原始、原创的动力支持。平心而论，中原农耕文化过份绵延深厚，的确生出了些许毒素。强调“用夏变夷”而绝对不允许让夏“变于夷”，在“文化涵化”过程中或许也不无积极作用，如管仲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的确使华夏正统文化风靡了周遭的“蛮貊之邦”。然而，过份强调文化上的无反馈性的单向输出，也必然衍生出文化的一元决定论的霸道作风和自恋自大的心态。同时也必然断送掉自己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活力源头。从而一旦遭到强势文化打击，则由于失去了一个文化对话上必持的平常心而导致文化心理上的自卑、自馁心态的抬头。人们现在已经明了：没有多元取向与之匹配的一元主流精英文化，难免会蹈历史上的儒道互补型庙堂文化一样的命运轨迹而走上衰微。而适时地补充进文化上的“杂菜粗粮”，或许正是防止衰微的悲剧再次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免疫机制。西部文化人看到了西部文化的这一意义和这种大众需求，于是他们便乐于经营这种多元化的带有“大众文化”色彩的花色品种，而且这样做了，便引来了东部人的赏目顾盼。

西部文化这种以反基础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在其反对文化上的一元决定论时，必然也派生出另一个特质，即表现为对“叙事话语”的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多样性的认同上。首先，在“叙事话语”的内容上，其反基础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细小事件和小人物的关注和对重大题材、重量级人物的疏离上，其文化事象不胜枚举。不啻是文艺界，即便是经济学这样的难以脱离主流政治文化圭臬的经世济用之学，一旦让西部人做了，也能崭然见一种凛然不俗的风骨。西北大学走出的经济学家在京城形成了“京城四少”。且不说张维迎、魏杰、刘世锦，以笔者较为熟悉的邹东涛为例，其人其文其事，就表现了企图突破权威话语的思维定势，从而执著于自己脚下的土地，直抒自己胸臆的张五常式的平民风格。这

种平民风格,正是西部文化反基础主义文化魅力的又一佐证。^[8]其次,西部的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不仅表现在对“元叙事话语”内容的多元化的解构和转换上,而且也直接表现为对“叙事话语”的形式——语言文字风格的解构与转换上。西部人最认同“话有三说,巧说为妙”的说法。这种解构元叙事话语形式的作法,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论”。众所周知,四川人以“摆龙门阵”而见长。刘伯承更被邓小平誉为“嘴上娱乐专家”。^[9]这种“游戏”性色彩不啻是表现在其诙谐幽默的风格上,而主要是指对一种“基础”性的“文本”的解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学说,被理论界称之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倾向的呼声的先声之鸣。维持根斯坦认为,世界根本不存在亘古不变、绝对稳定的“本质”,因而也不承认有反映这种“本质”规定性的“标准话语”、“绝对真理”、“权威观点”,他认为语言的形式具有复杂性,语言的功能具有多样性,语言的意义具有可变性。所以,他肯定会包容“道在尿溺”,“一点正经都没有”的“另类”风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西部人的“语言游戏论”色彩,正与美国西部社会兴起的雅俗共赏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相呼应。如美国英语中这种世俗与庙堂、下层与上层相互激荡的雅俗合流的趋势就来自于西部。在美国,目前“随口说一声俚语成了一种时髦”。^[10]这些现象看似说话技巧,其实反映了西部人的强悍和自信。

格里芬在为《后现代科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里说,如果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拿这种说法看中国,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中国西部可以通过了解东部在率先发展中所做的错事,能在西部大开发的初始阶段就能避免东部现代化的某些破坏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西部实际也已经“后现代化了”。当然,说西部文化已经是“后现代文化了”,只是看上去“仿佛”是,而实际上,那是文化发展上否定之否定阶段的螺旋曲线与文化初始阶段,即肯定阶段的螺旋曲线在某一视点、视角(如从上往下看)上审视时发生的某种重叠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谨记,如果以水平视点、视角观察,就发现两个阶

段显然有高低之别。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盲目乐观,甚至抱着现代新儒家的某种心态,认为天下之美尽在我西部大地。所以,那种以为以宋儒为主要内容的新儒学可以用来当做西部大开发的精神武器的想法,如果不是恬不知耻的自然经济中产生的前现代梦魇的死灰复燃,便是20世纪80年代末某些自由化思潮在新世纪里转换了手法来干扰我们西部大开发的坏心恶意。^[11]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祖数典,从而“丢尽自家无觅处,手捧金钵效贫儿。”对自己的脚下土地以及文化一笔抹煞,从而把自己弄成一点土粒也不粘的“豆芽菜。”只要我们“含英咀华,沉浸浓郁”,本着继承要到位,发扬要创新的精神,我们就会看到西部的巨大文化遗存,绝不是我们前进的包袱,而恰恰相反,是我们受用不尽的文化宝藏,只有我们善于发现,综合创新,文化会通,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全面小康社会早日到来的盛世景观。

参考文献:

- [1] 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 中华地域文化集成[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 [2] 肖云儒. 西部热和现代潮[J]. 文化研究,2001,(3).
- [3] 戴生歧. 西部大开发中的文化价值哲学之透视[J]. 唐都学刊,2001,(1).
- [4] 刘放桐. 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2.
- [8] 戴生歧. 酬得匹夫志 赤子一片心——读邹东涛教授的新著《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N]. 陕西日报,2002-06-28.
- [9] 陈金川. 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上册)[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 [10] 朱秀莲. 美国英语的起源特征及文化体现[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 [11] 戴生歧. 回归与超越——刍议前现代、后现代人文理想对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念养成中的功能[J]. 延安大学学报,1998,(1).

[责任编辑 杨彬智]